



# 紅色中國的挑戰

紅色中國的挑戰描寫了抗戰中國中一大半人民的覺醒，以及這一大半人民怎麼樣具體地，實際地解決了自治政府的問題。紅色中國的挑戰也描述了中國共產黨鬥爭的目標和成就。新中國的這種重要的政治發展是決定亞洲未來前途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因為這樣，這一本書不但是在國際上的重要著作，而且更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必須閱讀的重要著作。



# 跨進了延安的大門

——紅色中國之挑戰之二——

著因坦史 ● 室根  
譯 普 紫



• 1946 •

門大的安延了進跨  
——二之戰挑的國中色紅——

著因坦史·G  
譯 蒼 紫



社 晨 者 版 出  
局 書 源 智 售 經 總

· 版一第南華月九年六四九一 ·

有所權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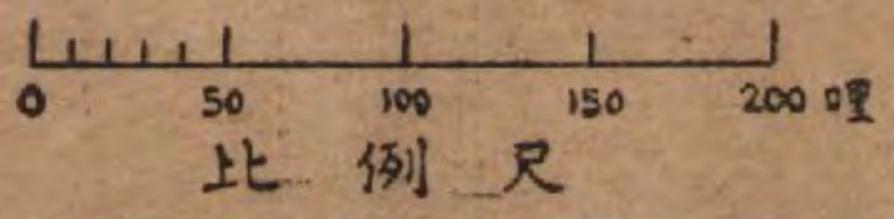
目 錄

- 一 通過封鎖線…………… 一
- 二 自給自足的士兵…………… 九
- 三 不愉快的事情…………… 一九
- 四 這就是延安…………… 二六



### 從重慶到延安

-  重慶反共封鎖線
-  共產黨游擊區
-  共產黨抗日根據地
-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軍前線



## 一 通過封鎖線

在我作爲駐外訪員的二十年中，我通過了不少的前線，但我從沒有覺得像這一次通過那個杳無人跡的緊密封鎖着的中國兩大部份之間的邊境時那樣來得窘迫。我們停在黃河的一個荒野的山谷間，那裏，一羣閣將軍部下的軍政長官已經集合了起來向我們告別。

在兩邊險削和蒼涼的山頭上，是望而生畏的碉堡、戰壕、還有幾個步哨。在黃河的渡口看不見一個居民；雖在平時，這裏的商旅是很熱鬧的。

一天前，一個兵士早帶着一面議和的白旗，向中共通知了我們的到臨；共產黨以爲我們是從別個方向來的，並且還派了一艘大船到黃河那邊來特別保持兩方面的接觸。



十六個船夫辛苦萬分地搖着我們橫過了急流。他們用全力拖着，帶着明快的，美麗的節奏，唱着古代的船夫曲，聲音尤如原始人向原野的禱告。

在另一岸，四個孤寂的人影，慢慢地移到河灘來迎接我們了。怕羞的，友誼的微笑；生疏的握手，和差不多簡略得不可相信的招呼，是中共區對我們的歡迎。沒有通常的交際和鞠躬，不交換名片也沒有嚴肅的，含糊不清的客套。

對於我們經過的每一個地方所遇到的那些盛大的招待會，集會，遊行，和歡呼的行列，我們真覺得膩了。現在遇到的雖適相反，我們終在感到困惑之外也感到了輕鬆。

『這地方叫做冷水岸。』我們隊伍中的一個國民黨員，帶着生硬的微笑說。

我們靜靜地爬上斜坡。跟着四個安閑的，穿着藍色制服的同志，走到了一個像是紀元前的小小的村莊里。

幾排窯洞，前面是牆圍的農園和泥築的馬房；一個敗壞的神座，像是給村上集會時作演說用的講台；幾個孩子在小廟的石階上嬉戲着；一個八路軍的士兵在村裏的高山崗上巡邏。這就是我們在中共區停留下來過第一夜的地方。

幾個農民已經替我們出清了他們家中磚造的床。每一只床大得足夠睡四五個人，佔據了大半個窯洞。靠牆整齊地堆着他們的農具，家具，一捆捆的乾菜和儲藏食物的桶。在邊區所過的愉快的第一夜

和冷水岸窖洞中那青草混和着泥土的氣味，將要在我的腦海裏留下永恆的記憶。

在窖洞前的小小農園裏，他們爲我們安放了清潔的草蓆。我們就在這草蓆上舒適地伸展着腿和臂。臉盆盛着湯麵蔬菜和炒蛋，用不着吩咐，就會送來作我們的晚餐；吃了二星期豐富的中國酒菜，這些小菜反很適口。

在園子裏，農婦們安靜地繼續在紡織、煮飯、和看護小孩，她們不大注意我們。從田野歸來的男人，給我們一個友誼的招呼之後，就把農具放到屋子的角落裏（這些農具似乎非常新而且是近代紀了的），去照料他們的牲口。生活像通常一樣地過去。沒有一個人爲我們而騷擾。

第二天早上，士兵帶着爲我們去延的五日騎程所用的馬和騾子來。士兵們顯得是飽經風霜的和營養充足的樣子；穿了麻鞋和寬大的藍色的綿布制服，佩着中國正規陸軍的紅色領章。

自一九三七年抗日統一戰線成立以來，中共部隊帽上的紅星已改換了中國國旗上的青天白日章了。但是這些紅色領章——像是比國民黨軍隊的規定要大一些，並且閃耀得更見得紅，因爲他們沒有那些通常的階級的標誌——似乎有着特別的意義。和有些兵士們身上，子彈帶上那閃耀的紅布一樣，這些領章像要表示出共產軍的特色和他們對於過去的懷戀。

兵士當中的一個就是王震；膚白，強壯，普羅列塔里亞型的三十四五歲的人，有着突出的牙齒，智慧的眼，準備着的笑容，和大而暖和的握手。

他帶着單純的友誼來歡迎我們，立正着，把手放在帽旁，『奉我的總司令朱德同志的命令，』他給了我一匹從日軍奪獲過來的馬。

兵士們指點我們越過了山崗削壁的山谷，穿過了沉澗般的山谷。他們都帶着日本的來福槍，或毛瑟槍，有幾個還有日本軍官用的長的武士刀，像槍一樣地掛在肩上。他們都是活潑、愉快的，經常唱着動聽的游擊隊歌。

土地是貧瘠的，有許多是半荒蕪的不毛之地，土是乾的黃的。『整個邊區全是這樣的，』王震說對我們說：『泥土的貧瘠，和因此而形成的人民的落後，是我們後方根據地的主要問題。但是我們解決了這些，像我們解決了別的問題一樣。』

比起同樣的毗連着的國民黨區域來，這裏已有了顯著的進步；一部份半荒蕪的，比另一岸大多了的土地，已經生長着一片青綠色的小麥和玉蜀黍。這樣開墾空地或荒地的工作已經進行五六年了。

我們常常穿過一大羣的農民，他們正在那麼傾斜的，不能用牛馬耕作的山坡上掘地和鋤草。『這些是「變工隊」，是我們所號召的許多自動合作的方式之一。』王震解釋着：『這使人民的生活起了大的變動，十二人一起的工作至少可抵十六人個別所作的工作。大多數的家庭都有了比平常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收穫。我們幾年來得到了好的天時，這大大有利於我們的開荒工作。大部份農民還是迷信的，他們說：「自從毛澤東來過後，就風調雨順了。」』

跟我在中國別處所看到的比起來，這裏的農民好像有較好的供養和衣著。他們似乎有更多的牲口。植綿是初次被介紹進來的，紡織是復活了，學校的數量增多了。總之，比一比我們經過的另一岸，這些難看的小小的窯洞的村落裏，是有着更多的生氣的。

我們所遇見的一些村長，給我們的印像是一些新型的，機智而實幹的貧農型的人物，他們之中，大多數是共產黨員，本地人。在紅軍長征到這裏之前，當這個邊區還是「蘇區」的時候，他們進行過殘酷的土地革命。但是現在我們聽說，延安當局在各地所發動的參議會的選舉，完全是自由和民主的，而且共產黨員的席數從不超過三分之一，如果超過了，他們將放棄自己的席數，給得票次多的非黨候選人。

在會議裏跟共產黨員坐在一起的許多人，據說都是從前的國民黨員。同時，我們還聽人說，一大部份動員人民努力生產，教育，互助工作，而且對於自治政府和延安「新民主主義」的其他一切政策發生很大興趣的新的「積極份子」，也都不是共產黨人自己。

這一切都是非常新奇的，我所得的印像，也是非常不夠讓我對我所聽到的，關於共區進步都斷定是真實的。這好像是大不能令人相信了。但這些小小的窯洞村落，比起對岸的村落來的確不同；這裏更活潑，而且一點也找不出有什麼拘束的現象。

在這些愉快的馬背上的日子裏，王震個人對我比別的任何事物都更有趣。這平凡的難看的模範兵

士，據說是一個旅長和包括延安在內的，邊區四分之一地區的防守司令，他有些不平常的吸引人的東西。他耐心地敘述着他和日軍的戰鬥，和他管轄下的地區內農民的經濟和文化的進步情形。

在以後幾個月的交往中，我才全部明白了，他是過去和現在的中國共產主義的化身。並且和許多戰鬥者一樣，在中國革命的事業中，他也擔任了典型的一部份。這些對於王震，（且不管他的真實的性格，）似乎並不是例外的。

一個下午，我從他那里得到他的生活史，雖然，他不想說他自己。他簡單地講述着，並不帶着對過去階級敵人的憤恨。

當他還是孩子的時候，在湖南他的鄉村里，他就受夠了貧困和封建的殘酷迫害。他對自由和知識的渴望，和他的火熱的反抗的性格，使他逃到了一個大城市去。在那裏，他全心全力地做過挑水的苦力，也做過菜販，直到他在粵漢路上得到了一個待遇較好的職業。夜校的學習，和職工運動，提高了他對於社會不平的自覺，這些不平使得中國農民落後；同時也燃起了他那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仇恨。他起先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大革命兩黨合作的時期，他又參加了國民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的『苦迭達』，把他從國民黨中開除出來。他參加了鐵路警衛隊的暴動受了傷，他不得不由一個隱藏的地方，逃出了他的生命。

王震的軍事生活，是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的。像中國歷史上許許多多的農民叛徒一樣，他首先回到故鄉的山野間去組織農民游擊小隊。後來一支支這樣的農民游擊小隊匯集起來，就變成中共的紅軍第

一師。王震就在那裏當了一名上等兵。在動盪的歲月裏，當年輕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強大的國民黨軍隊對抗的時候，王震將軍受過四次傷；在長征中他是中共紅第六軍的政治指導員。這一軍一共一萬二千人在長征中損失了九千人，王震也不能避免地受了二次傷。

八千五百哩的長征，十二個月差不多是不可思議的堅苦的，和可怕的無停止的戰鬥，彷彿使王震將軍進了參謀學校。他知道自己是準備着去迎接一定要來到的抗日戰爭。「抵抗民族敵人，早在一九三一年就是我們的真實的目的，」他說。「雖然，我們爲了生存還不得不和國民黨的軍隊對抗着；他們不去抗日，却要來攻擊我們。」

『但是對我來說，內戰在一九三五年就結束了。這一年，當我帶着飢渴的隊伍到達邊區時，毛澤東同志已經發動了統一戰線的運動。由於這個原因，他命令我們，不再向國民黨軍隊發動反攻，雖然，他們還繼續從西安來進攻我們。我當時是一個副旅長，我負責訓練全旅準備對日戰爭，並且在政治上，教育他們和國民黨作統一戰線的合作。當抗日戰爭爆發時，我們已準備好了。有一個時期，的確和國民黨有過真實的合作。我們掩護了正規的國民黨軍隊自北向南撤退，以後，我們自己突進到北方敵人戰線的後面。我把在長征中鍛鍊過的老幹部，作爲由敵後工農義勇軍組成的新的單位的骨幹。我的一旅也長大了。我們在華北和日軍進行很多次戰鬥，直到——』他嘆息着：『我們奉命撤回……』

爲什麼王震堅強的部隊今天不在前線繼續打擊日軍，要回到邊區呢？

第一，他們需要防守延安，抵抗日軍。當時敵人就在黃河對岸，在我們渡河處的北面不遠的地方，佔住了強大的據點，他們時斷時續地企圖渡河進攻延安，他們對於延安似乎比對於重慶更是憤恨。加上當時重慶和延安之間的關係，從沒有像抗戰初期那一陣時期的好轉過，共產黨人感覺到，當日軍發動了大攻勢，他們不能將邊區週圍的胡宗南部隊的援助估計在內。

『胡宗南援助過我們？決沒有。』王震說。

第二件工作是保衛邊區，防止在封鎖線邊上的胡宗南部隊的進攻，這些部隊比起共產黨的四五萬的防守部隊，要大十倍。

『我們的第三個任務，』他着重地說。『保持一個精粹的隊伍，準備配合盟軍對日總反攻。』

到後來，我對於王震的認識足夠了，所以當他表示着對於這麼一天的期望，又非常諒解地談論着他的部下多麼不耐煩地期待着那樣的一個戰線時——我相信了他。

## 二 自給自足的士兵

王震和他的一萬人，從前線回來後，還擔任了別一件任務，他們得到了另一種勝利，他們有理由來誇耀自己。他們執行了『實行自給自足，減輕人民負擔，領導生產運動』的命令。

王震像是充滿了熱情和活力，當我們來到南泥灣，看見他的全旅士兵在生產戰線上的時候。一個老革命者和戰士表現了全新的面目，像後來我在延安所見到的軍事領袖一樣：他變成了大生產運動的天生領袖，一個墾荒者，和教育者。

在南泥灣，我所見到的一切，使他那動人的故事中每一個字都特別真實和生動了。

『你們已經看見過邊區是多麼貧窮的，』他說。『你們也看見過包圍着我們的封鎖地帶，你們知

道重慶政府從不給我們給養的，你們也明白我們還面對着黃河對岸的日軍。那末，你們一定會懂得：我們從前線回來，困難的道路是排在我們的前面，要我們去選擇——半飢餓地活着，削弱我們自己和戰鬥力，而且以我們的最低要求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或是，我知道還沒有軍隊這樣做過的：自足自給，同時加緊訓練，加緊準備，一有命令就走向戰鬥。

『當時我將這個方法坦白地在我的部隊面前提了出來。我得到了許多不同的意見。他們的心全是傾向着打擊日軍。他們中間的大部份不願意在戰事還在進行的時候去開荒和作農民的工作。我們有許多困難。但是後來我們一致同意：毛澤東同志的命令在客觀上是準確的。只有少數還不全部明白，爲什麼我們要在南泥灣的山野上耕作而不回到前線去。』

我想起了另一岸的八路軍逃兵的事，我將宜川緝私機關的首長給我的三張逃兵的證章，交給了王震，同時我注視他的反應。

『是的，這是我的部下。』王震不加猶豫地說，『或許他們就是不明白的幾個，也許他們對於我們的工作覺得太堅苦了。我不大關心他們的逃亡，他們站在那一面來抗日，在我們這面，或是國民黨那裏，這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只要他們參加戰爭的事業。』

他繼續他的故事：

『大約在一百年前，此地回教徒反抗北京清朝所起的大暴動，使這廣大的南泥灣區的人口減少了

。山上的土地和山谷的田都荒蕪了。四年前，當我領導着我的隊伍首先發動軍隊生產運動的時候，這裏還沒有爲我們住的窯洞和房屋，沒有食物可買，沒有農具，也沒有願意幫助我們工作的農夫。

『邊區在那個時候是那樣的貧困，我們沒有足夠的糧食和用具。我們從延安政府只得到一點點錢。一開始我們所需的每一件東西都要自己來供給的。我們砍下樹木搭起原始的居屋，還掘了幾個窯洞。我們開墾了一小片土地，才得到蔬菜。我們沒有吃得飽過。』

『爲着交換我們所急需的貨物，我們砍下堅硬的柏樹，賣給村民。因爲週圍區域裏的民衆都喜歡用它做棺材的。你們所通過的那些地方的村長，都幫助我們，從農民那裏借給我們舊的農具，這些農民們也都盡力地幫我們忙。』

『我們的農具問題最後是得到解決了。我的部下，有一個年輕的劉連長，他在山頂上的破廟裏，發現了一只大而古老的鐵鐘；搬下來是太重了（不知道是怎麼搬上去的）劉連長就在鐘的下面掘了一個大洞，將它溶化了。我們找到幾個鐵匠，他們教我的部下怎樣從這個大鐘所得到的二千磅的鐵，和從別的村莊所得到的的一些廢料來製造農具。』

劉連長得鐘，和怎樣靠了這隻鐘開墾了幾千畝土地的故事，在共區裏已經編成了很成功的舞台劇和秧歌舞；幾星期以後，我們在延安就看見它的演出有高度的熱情和技巧。

『我們製了比我們需要還多的農具。我們廉價售給農民，但是，首先，我們將借來的農具變成新的還給了他們，你們在初次停下來的水岸地方所見到的新的鋤頭，就是由我們軍隊里的鐵匠所製』

的。」

『許多困難是要克服的，第一是我自己對生產還不大懂得，我請求我一旅中的每一個人，提供他們的知識和經驗，批判和修改我所作的計劃。每一件事，我們一起討論，正好像我們一起做一切工作一樣。在八路軍裏，對戰爭或是工作，只有一個等級的區別：我們的幹部，我們稱爲長官，不管做什麼工作，都要比其他同志，工作得更好和更堅苦。』

今天，在南泥灣，有三萬五千畝以上的荒地，都開墾好了。今年，在這廣大的，他們驕傲地稱爲：「革命的地產」上，一萬人中的每一個人，平均可出產一噸的小米，大米，麥，玉蜀黍，蔬菜，棉花，大麻，和煙草。

每拾個人，養了一頭牛，十頭羊，五只豬。每一隊至少有一百只雞，鴨或是兔子。

王震的隊伍不花費納稅人的一分錢，相反的，他們在各方面幫助了民衆。

在邊區，或是其他敵後抗日根據地，他的部下，和學習他的方法的八路軍其他單位，現在都成了全中國給養最好的軍隊，雖然藥品的供養還是極其缺少，但是由於營養大大改進，生病和死亡率是減少了許多。

對於這種能夠大部自給的軍隊，人民是比從前更加敬愛了。『代替了對貧農的強索和掠奪。』許多農民告訴我。『這些新的兵士却幫助了農民。』

這是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王震給他部下的命令的一部份。

『（一）爲執行毛澤東主席的路線，去年我們糧食生產已超過了賀龍師長所號召的數目的二倍。今年，我們生產目標是去年實收的二倍，但是我們至少要越過三分之一，生產一萬三千噸小米。

『（二）自三月十日至十月底，確定爲農業生產的時期。由於下雨和耕種，鋤地收穫之間間歇，將有五十天左右的时间作爲休養，軍訓，和抗日的政治教育。

『（三）除從事於衛生，工業，和交通工作外；全旅同志，包括幹部（長官）和士兵，都必須平均開墾五畝土地。

『（四）爲着執行增加生產，保證軍隊和政府給養，兼顧公私利益，建立革命的產業等任務；以求團結人民武裝抗戰與保衛邊區，按照每人平均生產二十四百四十磅計算，下例的生產分配必須爭取完成：百分之三十供養全旅，百分之四作爲自己衣服費，百分之三十三作爲軍隊儲糧；百分之三十三作爲個人收入，可按當時糧價折合現款，投資合作社，匯回家用，或作個人費用。

『（五）生產運動，在革命事業中，是堅苦的工作。每一單位的幹部，兵士，和政治工作者，必須全部執行任務，團結一致，互相鼓勵和幫助。……』

旅長兼政治委員王震（簽名）

南泥灣的收成是良好的，將是超過計劃的。但是即使是這樣，也只是達到水準。在一九四四年王

震的一旅不但要做到充分地自給自足，並且還得有一年餘糧。『爲着反攻。』當我問起王震將軍這餘糧的用途時，他重地鄭說。同時，還得將收成的三分之一供給市場，使兵士可以得到他個人的現金收入。

『我們的生產還得繼續擴大，每一年我們將開墾更多的土地，』王震說。『戰後南泥灣將供養二萬人民——傷兵，和國民黨統治下的（像河南）災區裏的難民。許多河南飢餓的居民已經偷過封鎖線來到我們的邊區，因爲他們知道我們會幫助他們安居。』（後來我的確看到一大批這種難民。）

在南泥灣的日子，是我在遠東最好的經歷之一。

我們看見一排排穿着白色內衣的人，在開墾着沼澤和乾裂的山地，或且正在耕好了的田裏工作着。『這是連長，營長，或是團長。』王震會這麼說；同時拉出一個勤勞工作着的人，驕傲地舉起他那因辛苦工作而起繭的手。或是：『他，十二歲就加入紅軍長征，他現在是連長，不論是在敵人之前或是農業生產上，他都是我最好的部下之一。』

我們看見整齊的營房密洞，餐室和俱樂部，醫院和療養院，這些都是士兵們自己造的。我們看到工作場，這裏殘廢軍人和兵士的妻子在織紡和縫製全旅的制服。我們也看見到鐵店和印刷所，以及製造紙張，肥皂和酒精的小型工場。

我們遇到幾個由王震部下選出來的著名的「勞動英雄」。一個還是穿了八路軍制服的日本戰俘，

他幫助南泥灣的建設。他曾設計了一只新式的抽水機，和一所近代化的蜂房，還有許多別的東西。他很像個八路軍的士兵，愉快而自然，全不像是日本人，而且他堅決地反對日本軍國主義。

當王震走近時，我們看到，許多長官和士兵都用微笑來歡迎他，這是，沒有別的了，只是當作他們對旅長將軍的敬禮。但是，賀龍師長後來竟告訴我，他已經好幾次批評過王震，說他對他部下的管理太嚴和太粗暴了。王震自己也承認這些缺點，並且告訴我，他在改正着。但是無論如何，他的部下總是喜歡他的。

王震的雙手也像他的部下一樣，由於勞動而生滿了繭。後來國際和平醫院的一但美國醫生告訴我，他最近替旅長將軍的大足趾敷上了藥膏，因為他和別的長官一樣，在幫他的士兵工作時，讓一袋重的煤塊壓壞了他的腳趾。

南泥灣的人是天生的優秀兵士，或許，要算是全中國最好的了。

我問王震將軍，他的士兵的戰鬥力，會不會由於生產工作而減低。他聽了覺得非常驚奇。

『他們是比從前更好的。』他說。『第一，他們是更健康和強壯了。他們一生之中，還沒有得過這麼好的食物和這麼多的體育訓練。第二，他們在冬季有整整五個月的軍事訓練——堅苦的真正訓練。而且在夏季，沉悶的農業節裏，有整整一月的軍事訓練。甚至在農忙的時候，一有片刻休息時間，他們從沒有不去練習拋擲手榴彈，刺刀肉搏，和其他技術。你大概已經見到他們是帶了來福槍呀』

田裏去的。他們隨時準備着戰鬥。』

我們逐一訪問了在整潔的窖洞的每連司令部。武器是好好地保存着。我花了二天的功夫去計算，他們有多少的配備是日軍的，我把它紀錄了下來。這的確是真實的，差不多三分之一以上的步槍，三分之二的機關槍和大砲的大部都是由敵人處繳獲來的。

『這全部是由我的一旅奪獲來的。』王震說。

每一尊山砲都有着一個出奇的故事。這些故事我大部份是從親自參加奪獲的士兵處聽來的，而且他們常常說起對日軍戰鬥犧牲了的兵士的姓名。對死者的回憶到處活躍着。三年多的戰爭使這一旅有着很的傷亡。

這些戰士現在都是善於運用日軍武器的專家。他們完全學會了怎樣用法。在這一方面，那些由於八路軍的教育，而去除了法西斯意識，變成了反抗東京軍閥戰士的日本戰俘幫了很大的忙，並且教他們學習日本皇軍的軍事技術。在最後一次的總反攻中，他們希望從日軍奪獲大量的武器，而且一奪到手，就用來打擊敵人。

『全旅精於夜間行動，我的部下無論如何是最優秀的。』王震說。『我們繼續在最困苦的肉體勞動中，給他們嚴格的訓練。他們已有顯著的進步了。』

他從筆記簿上，讀出了最近全旅的作業紀錄。在步槍射擊中，幹部和士兵，包括醫生，看護，廚子，和運輸工作者的百分之九十四，可以在一百十碼的距離內，命中半徑一碼的目標。他們全副武裝

，在急行軍時，拋擲手榴彈平均的命中距離是四十三碼。在衝鋒的時候，衝過置有五重障礙，和七個目標的一百六十五碼的距離，再加上拋擲三顆手榴彈，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只要三分鐘或且還不到三分的時間。

由於我們的請求，幾隊兵士奉命作了一次假想戰，在能力，技術，和速度上這是很深刻的演出。

王震也是非軍事方面的熱心的教師，他非常關心提高部下的文化水準。像八路軍全部長官一樣，他也是多方面的領袖人物。

南泥灣也是一所忙碌的學校，就像是一個偉大的生產場，和模範的軍事訓練地一樣。

『我們將中國兵士單調的情況，改成充實，豐富的生活。並且我們繼續提高全旅政治和文化的水準。不管中國字結構上的困難，我們部隊識字的程度是很高的：只有百分之二十識的和寫的字，少於五百個，百分之四十認識五百到一千，其餘的人，超過一千字，或且他是完全識字的。三分之一的教育時間是化在提高文化水準的方面的。』

主要的教育方式是着重於自由和坦白的討論，這是一個民主的方式。在我與一些普通士兵談談的時候，我注意到，這似乎是由於經常舉行檢討會的結果，這些認字並不多的人，有着比一般民衆較高的普通知識和語彙水準。

『去年夏季，當毛澤東同志要求我加強部隊的文化教育時，我告訴他，我自己還只是個不大識字

的人。但是毛澤東同志要我這樣做。要我在工作過程中去學習。我和延安的知識份子有一次長時間的討論，我告訴他們，我們文化上的缺點，於是我就和他們共同訂下了一個堅強的教育程序。後來我又號召出名的作家來南泥灣作長期的訪問，同時幫助我們。」

我向王震問起關於全旅政治教育的內容。

「這有兩個目標：教會他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憎恨，和提高民族的自信力。我們已經脫出了那老的抽象的革命教育。我們，總是用最簡單的，具體的，爲士兵們自己所知道的，關於日軍在中國農村裏的罪行的例子；並且就用我們一旅在南泥灣如何和周圍老百姓民主合作的實際例子去教育他們。」

「從這些爲我們部下所經驗過的和熟知的例子當中，引導出我們領導軍隊、政權和黨從事於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的實殘的政治原則。」

「各人自己意見的說明，在教育中是有很大的作用。而且爲了有效果，必須做到真正的自由。如果我們的部下有了錯誤的見解，我們責備自己，而不是責備他們。我們希望用討論而不是用命令去說服他們。」

### 三 不愉快的事情

對於中共的非難，我在重慶已經聽到許多了，但是這些非難，在南泥灣鐵的現實之前，都變成沒有甚麼意義的了。我們全體都這樣的感覺着。

可是我始終沒有把這些非難忘記掉。

鴉片問題要算是其中的第一件；重慶曾經把它大大渲染起來，去攻擊延安。

我們從一個出乎中共預料之外的路向來到了邊區，而且通過了這個『人跡罕到的地方』。據西安的陝西當局說，就是在這個共區裏，出產着大量的鴉片。

我們時時刻刻都在找尋罌粟。王震好幾次向我們的國民黨同伴和我們提議，隨便花多少時間，隨

便到那一個地方，去找找看有沒有罌粟。沒有人接受他的建議。我們來時走過了夠多的地方，也走過了許多丘陵起伏的村野，這已經使我們獲得了廣闊的視野。

我們全國的人常常聚合在一塊，沒有人說起看見過半棵罌粟。但是過了幾個星期，當幾位中國記者和三位國民政府派來的顧問回去之後，受到國民黨補助的重慶猛力新聞社（譯音）就從西安發出下錄的報導：

『中外新聞記者西北訪問團，在由晉赴延途中，忽接中共當局決定，即時放棄原路，改經宜川循公路入延。該團在晉西渡過黃河，復經無數荒僻鄉莊，始到達通延大道。

『該團足跡所及各地，遍植罌粟，紫花爭豔，蔚爲奇觀。

『若干記者最近有函由延寄至山西三民主義青年團支團部，詳述彼等見聞。信中附詩一首如下：

「到處長着一種奇異的花，

我可不知道她的名稱，

下騎借問老者，

他們都搖頭擺手緘口不言。」』

就是這一種情報，國民黨拿來做根據，去攻擊共產黨嗎？就是這一種消息，經常報告給蔣委員長嗎？

我還注意找尋中共反對中央政府的標語，據說爲了討好我們，中共已經把它換成和中央合作的標語了。有一次我們在一個小鎮上過夜，一位國民黨顧問私下告訴我，他們在一家房子的牆壁上尋到了三張反中央的標語，上面寫着：『反動派如敢進攻邊區，擊退他！』『國民黨殘害人民！』另外已經破損的一張是：『打倒國民黨！』

不久後，我們和地方長官舉行一個新聞會議，王震將軍來參加，此外還有一位年青的中共幹部陳家康，他在中共駐渝代表團本部內服務的時期，我就認識他。

席間，我先沒有說明我如何曉得這些標語，就很坦白地向王震問起這件事，問他這種標語是甚麼時候用的。王震說他並不知道有這種標語，他說即使有，第三張可能是內戰時期留下來的，其他兩張也許是一九四三年夏天的東西，那時候整個邊區是陷在國民黨軍隊圍攻的嚴重威脅下。他說爲着全國團結的利益，中共當前的目的是促進對國民黨合作，避免一切刺激，假如有人違背了這種政策，他就要加以嚴究和懲罰。

依然是很溫和而文雅的陳家康，這時也站起來，帶着極平憤慨的情緒說話：『在內戰時期，根據我們的政策，這種口號是被廣泛地採用着，但是自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以後，我們就放棄了這種政策，中共並沒有任何打擊國民黨的企圖，我們完全做到這一點。』他又向着他的友黨同志提高聲音說：『「打倒國民黨」的口號，跟你們「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這就我們所曉得，直到現在還是

在國民黨控制下的西北地區，被普遍地使用着——同樣對我們的國家有很大的損害。」

我提議我們親自去看一看那些標語。我們持着燈籠，一塊兒到小鎮上那條已經浸在睡鄉裏的大街上去找。

最後，我們在一間店舖裏，纔找到兩條狹小的紅紙頭，那就是中國人貼在門窗和牆壁上的紙聯，上面寫着古典的聯對，有時也寫上一些個人的意見。第三張標語已經完全撕去了，還有一些碎片留在地上。三張紙頭都是舊的，而且褪了色，混在其他許許多多新的大的標語中間，更顯得不足重視了。這許多新的口號都是積極的，實際的，都和邊區推動增產，教育和加強抗戰努力的宣傳配合起來的。

我們又藉着燭光，在官署庭院裏，恢復了會議，周圍的氣氛是顯得相當的緊張。

王震開始發言，起先還很冷靜，後來愈說愈憤慨：「諸位新聞記者現在來到此間，同一時候，林伯渠同志飛到重慶進行國共談判，這兩件事對於中華民國都是有利的，重要的。我現在重新向你們保證，你們有權利自由地去研究我們的任何工作，我們歡迎你們這樣做。但是去發掘以往內戰時代的口號是有害的。我毫不躊躇地要抨擊企圖在外國朋友的面前散播挑撥種子的任何人，我坦白地說，像這種活動如其說是新聞記者的工作，不如說是間諜的工作。」

「全世界法西斯的勢力已在削弱，民主的力量却正不斷地增大，這是對於中國非常有利的。但是，痛心得很，在我們中間竟有許多人一直還在散播不和的種子。我擔任了這一地方的防守司令，對於過時的標語還留在這個鎮上的房子裏，我應當負責，我也要好好去處理；但是我願意告訴大家，這種

標語在現在只有一個意義，一個重大的意義，那就是：它告訴我們，在我們兩黨的關係上，曾經有過這麼一段的歷史！」

王震的赤誠給予每個人一個深刻的印象，雖然他那湖南人暴躁的性格，和對於民族團結的強烈願望，在那時候戰勝了他對於應予慎重看待的國共關係，慣常所保持的緘默的態度。

從第一天起，我們就留心觀察我們同伴中的國民黨員和共產黨間的友誼。我們熱望他們彼此的關係會向着友好的方面發展。我們閒逸地騎在馬背上，橫過美麗的山村；我們在白天裏，就道旁共餐着臨時做的便飯；長夜裏，在許多奇怪的休息地方，同享着豐富而精美的便菜和土產名酒；這一切好像都是特別爲我們安排的私人接觸的好機會。這也許對於重慶和延安間走上互相諒解，有些微的幫助，那是我們全體記者所衷心希望的……

我們訪問團團長，溫和的薛博士倒和我們很合得來。他是屬於孫科系的人物，自稱是開明的自由派；孫科本人則是國民黨進步派的領袖。王震的確是個熱心的愛國者和可敬愛的人物，他們之間一定能夠得到友好……

現在王震發表了這樣尖銳憤激的談話，我很懷疑也許暗地裏還發生了許多我們沒有曉得的，或且比那三張紅紙頭更使王震激怒的事情。

的確，背後還有許多事情。

第二天，當王震、陳家康和我騎馬騎得精疲力竭，在一座小山頂上休息的時候，王震告訴我說，他曾受到一個刺激，這，在前天晚上，使他更引起了憤慨激動的情緒。

「當我第一次和你們的團長，他是重慶政府的官吏，談了一些時候之後，他就說了一段話，深深地使我感到憤恨。他說：『那些外國記者是無足輕重的，我們應當去管教這一批新聞記者，他們沒有個人隨心所欲的權利；他們應該遵從命令，同時一切必須由我們安排。』」

「第二天，我去拜訪其中兩位長官。他們打算給我一個教訓。他們說：『你對於外國人太熱心了，好像你以爲他們也許對於共產黨有些用處。』隨後他們就把你們逐一介紹給我聽。下面就是他們，主要是那位負責的團長薛博士，所說的話：『在許多外國人中間，一位美國牧師，另一位美國人是在中宣部工作，一位蘇聯的塔斯社記者，其餘三位是地道的猶太人，沒有品行，沒有學問，沒有教養，全沒有甚麼用處；你總也曉得，猶太人本來就是這樣的。他們僅僅是新聞記者，他們生活着，工作着，是爲了賺銀元和金鎊，就是在他們自己中間也猛烈地競爭着，因爲新聞是可以賣錢的。』」

「我聽了非常的憤怒，」王震繼續說下去。「雖然後來我自己還是忍耐下來。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中國人，一個共產黨的軍人，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要打倒國際任何種類的法西斯主義，但是我完全不願意去聽任何人在宣傳的法西斯理論。」

「你說的話像希特勒和東條所說的。」我告訴那位國民黨員，「你所說的話，對我和我們的實際友人都是一種侮辱。」後來他們站起來，異口同聲地對我解釋：「請你不要誤會我們，中國的問題

是內部的問題，家裏事應該在自己中間討論，用不着對外國人說。」我不發一語，就氣憤憤地跑出來。

『我曾經好幾次在全體國民黨記者的面前，提起了這件事，他們中間有幾位聽後似乎很震駭。我特別釘住說這些話的那兩位，可是他們沒有否認過一句話。』

在我們離開南泥灣，結束最後一段旅程，到延安去的前一個晚上，我們聚集在司令部前的一塊空地上，在明亮的月光下，王震將軍的部屬和他們的妻子表演秧歌舞蹈給我們看，在我們的周圍團團繞着許多兵士。

王震將軍突然被叫去聽電話，當他回來的時候，他跳上桌子，發狂似的，帶着非常興奮的語調，大聲地向我們叫喊着：『朋友們！第二戰線已經開關了，歐洲已經受到了攻擊，美國和英國的軍隊在法國登陸！』

接着，他又揮動着拳，拉開了喉嚨，興奮地酬答他的部下雷般的歡呼：

『打倒法西斯！』

『民主萬歲！』

#### 四 這就是延安

延安是顯得農村似的，安逸和純潔的樣子。她如其說是中共軍政的中心，毋寧說好比那中世紀學校的校園一樣。

太陽把合於農村和諧的明快的歌曲，投向那半荒蕪的，但也特別吸引人們注意的大地上。

一座千餘年的古塔，恰好矗立在一個匯合着三條狹谷的小山頭上，照耀得格外高大和澄黃。山谷裏沒有樹，顯出奇異的空虛，只有幾個低矮的屋子另散地點綴着。附近一座破舊的城牆把古老的延安掩蔽住。許多磚泥屋子都給日本的炸彈粉碎了，只剩下少數半毀的石頭門，還孤零零地立在道旁。好許多瓦礫場，經過秋雨的掃刷，又變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地，上面長滿了青青的亞麻。

一串接連着的，光禿的山頭，在那沙岡似的黃土地的深黃色和斜倒的麥子和黍子的青綠色間閃爍着。

山坡裏盡是無數小的窯洞，在四周明亮景物的陪襯下顯出點點黑影。這些窯洞是原始人穴居的粗糙的歷史痕跡。薄薄一重的輕煙，從那看不清的萬家煙囪裏緩慢地昇起來。那一長排，齊整的，引向各機關，各醫院的現代窯洞建築里去的拱形入口，重重疊疊地刻劃在那平削的黃土崗的閃耀的表面上，正像在山崩裏埋沒了一半的大樓一樣。

山谷裏和山坡上，有許多綿羊、山羊、牛和馬在吃草。農夫們戴着闊邊的草帽，在他們心愛的田地上耕作。有許多穿着黑布和白布衣服的人蹲在淺河的石頭上洗衣服，或者替小孩和自己洗澡。滿載着貨物的驢子騾子和馬，響着叮噠叮噠的鈴聲，搖擺着紅色的流蘇，在黃泥路上，挨過那穿着褪色的竹布服裝，態度閒散的公務員、學生和士兵身邊，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動。鐵匠在茅棚裏打着農具。工人在路旁造磚頭。商人忙着照顧攤頭和小店鋪。小孩子們在學校的廣場裏逛。

我們住在政府的招待所裏；一座精巧的花園混合着一部份的窯房和幾所小的磚瓦屋子。幾位待役用友誼的，自然的態度來招待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間小房間住。房間的地上是用磚鋪的，窗是用紙糊的，房內有一張臨時搭起

來的板床，一只新的大桌子和一些鮮花。經過長途跋涉之後，我們現在可以獨個兒從容地躺下來休息了。

共產黨似乎並不像我所想像的那樣會替自己作誇大的宣傳。在開頭的幾天，我沒有發現些甚麼。他們好像很歡迎我們，而且很願意幫助我們。但是他們並沒有故意裝腔作勢，故示沉着，企圖給我們好的印象。他們對我們的態度似乎是：盡量用你自己的眼睛，去找出我們的祕密吧！

他們對於我們的國民黨顧問顯然是表示着疑慮。薛博士那種被稱做法西斯主義的排猶排外主義，似乎給他們很深的印象。訪問團中間有許多國民黨黨員露出不安的樣子。開始他們之間的關係就顯得相當緊張，雖然他們在外表上，彼此還很親密。這使我想起了，重慶中宣部把國共衝突叫做「家務」的這一個可愛的名稱來。

在我們招待所裏發生着的一件國共對立的事情，的確是屬於家務的。訪問團裏的一位國民黨顧問的家庭，像其他中國一般中上階級的家庭一樣，也分成不同信仰的兩派：他和其餘五位兄弟中的兩個是國民黨員，在重慶工作，另外三個則是共產黨員，住在延安。這三位共產黨員，很顯然地，不願意去看他們這位屬於國民黨右翼的兄弟，雖然後來必竟還是很勉強地形式地會見他。這件事情，在我們的國民黨同伴間，引起了關於共產黨有意給不幸的異教徒以難堪的，強烈的猜疑。

我們對於延安暫時還是茫然無知的。開頭我們化了好幾天時間，和在這裏遇到的兩位外國人談論

。一位是英國的經濟學家，他在珍珠港事變的那一天，就從日本佔領下的北平逃出來，自那時候起，他一直幫助八路軍，從事於無線電的技術工作。另一位是美國醫生，他替自己起了個中國名，叫做馬海德，他在一所地方醫院已經服務六年了。他們兩位都說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們對於邊區和共產黨控制下的抗日根據地，都給予極好的讚詞。

我的白天和多數晚上的時間，全被許多工作擠滿了。在我新聞記者的全部生涯中，我還沒有做過這樣緊張的工作。

我要去解釋許多疑問，要從我平生所獲得的，對於亞洲還是全新的，強烈而驚奇的全部印象後面，找出一個真實的結論。我時時刻刻都在個別地拜訪許多共產黨員，非共產黨員的領袖和重要的長官。我並不過份考慮到他們有沒有空，我很覺得過意不去。事實上，我是在詰問他們，不拘禮貌地，詳細地問起他們全部的政治生活的故事，同時根據國民黨對於「共匪」的許多攻擊，提出很多不愉快的問題。我在遠東還沒有見過任何一個人肯讓我作這樣的訪問，但是延安人似乎對這全不在意。

我訪問過政府機關，軍事機關，工廠，模範農場，大學，普通學校，醫院，法庭和監獄。有時我偶然還去參加自治團體的集會。我和許多公正的人，特別是非共產黨人談話。根據我在中國其他地方所獲的經驗，和我對於蘇聯共產主義的認識，我常常找出一條新的，能夠正確地接近事實真相的路徑，去探尋延安政治的理論與實際的全貌。

我是完全自由地從事於我的研究，我可以隨便到我所要到的地方，隨便找我所要找的人談話。沒有顧忌地提出任何問題，也沒有遭到被拒絕回答。

延安的政治舞台，表現着鄉野般的平靜和簡樸，正好比她的政治生命，用一種緩慢的，但也是恆久的，自然的拍子繼續生存着。

前面就是中共的黨部，人們按照那個地方的舊名稱，叫她做「楊家山」。

一塊養兔場，幾座刷得粉白的辦公屋子，和一些居住的窑洞，其間有許多貫穿過菜畦的小徑和土階接連起來。祕書處是一所近代化的建築，中共中央委員會就是在這裏指揮一百多萬黨員的工作。一座石建的大講堂的牆壁，與馬克斯、恩格思、列寧、斯大林並排，掛着羅斯福、邱吉爾和蔣介石的像（非共產黨人的三巨頭的像，和其他幾張一樣，已經是很舊的了，顯然不似剛剛掛上去的）。

黨部是平靜的，但也是一個忙碌的地方。從幾百個中共幹部的個別活動和集體工作中，可以看出他們似乎都充滿着先鋒者那種率直的，自信的熱情。

一個五十歲的人，穿着寬大的衣服，高個子，顯得笨重，有極好的外表，說話和行動略有點不靈巧，黨部裏的人跟他在一起，好像都感到溫情和親切，這就是毛澤東，黨的主席，中共裏卓越偉大的人物。

毛澤東是農家的兒子，曾做過教師。他的外貌和行動還很像個農夫和教師——那麼閒逸的簡樸的

，那麼富於思想的和精細的。他那表現着很有威力的前額，有着洞察力的眼睛，聚精會神和深思熟慮的態度，冷靜而清明的腦子，再加上那圓熟的人格，似乎就是一個天才的，老練的政治家和人民領袖的記號。他和蔣介石那莊嚴的，剛強的，叱咤風雲的軍人性格恰好成爲兩個極端。

山谷上面不遠的就是軍部。那本來是從前一位有名地主的業產，人們稱他做「王家坪」。軍部的建築和黨部差不多，在正面一個低矮的石門口，站着幾位穿藍布軍服的哨兵。

她就是中共武力的神經中心。屋子裏出人意料之外，還有舊式的無線電設備，每日都從這兒收到，由深入敵後的華北華中各地發來的戰鬥報告。

一所小泥屋裏布置着一間簡單的戰略室，內中有許多的戰爭形勢圖，描出了軍事史上最錯縱複雜的戰略部署。中共從敵人手中解放出來，分散在各處的抗日根據地，大的一共有十三個，還有許多小的。全部根據地裏有八千萬至九千萬的人口，和二百萬以上的民兵。中共機動的正規主力軍，據確切的估計有五十多萬。

有的戰略圖，仔細記載着幾十萬敵軍和無數僞軍的分佈情形。它說明了敵人是如何地被中共圍困住——圍困在沿着鐵道和公路的狹窄地區和城鎮的小圈子裏。

總司令部裏工作的幾百位指揮官都非常忙碌。因爲時時刻刻都有各地司令官，從各個前線，步行或且騎着馬，跋涉了好幾個月，一路上衝過好許多敵人嚴密戒備的火線，來到延安。中共準備配合盟

軍展開對日總反攻的整個計劃，似乎已經在夏天決定了。

朱德將軍是中共軍的總司令。他已經五十八歲了，是一個闊大的，笨重的，非常強壯的人。他不大說話，有着那顯得有才智的深線條的農人的臉孔。他是他的部下和人民所熟悉和敬愛的，他常常露出快樂和親切的笑容，使每個人都會感到安慰。他是勇敢的革命戰士，權威的戰略家和人民的領袖。

『他是聰明和誠實的。』一位國民黨同伴曾對我這樣批評過朱德將軍。很明顯的，這一定是大大出他意料之外的。

中共力量的第三個中心，似乎是那正在萌芽的新民主主義的自治制度；這個制度已經被中共建立起來了。

人民參議會是在城的中心；是一座矗立在混雜着花園菜地的園子裏，米倉似的大講廳。除了邊區政府的那些堅固的平屋之外，它要算是最好的了。在這裏，由全邊區人民自由選舉出來，代表自己各階層的男女參議員，去立法和執行統治。

頗爲奇怪的，人民似乎只受到了一個限制：由人民選舉參議員，參議員之間再互選常務委員和邊區政府的首腦，但是，像我們早就聽到的，共產黨人不能占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席數！人民參議員和常務委員以及政府的負責長官，全部的三分之二必須是非共產黨人。

更加奇怪的，在一切選舉團體和其他各處，中共嚴格命令黨員，盡可能要去幫助非黨同僚的工作

，和推進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那就是中共領導者所肯定的，要把自己限制為三分之一的少數。

延安政治舞台上最有趣味的背景要算是羣衆大會，戲劇公演和活潑中充滿着地方情調的秧歌舞。有許多穿着沒有徽章的，和普通士兵一樣的藍布軍服，很引不起人們注意的，也許正在和似乎是不相識的老百姓閒談的人物，往往就是很有名的軍事領袖。

還有那些穿着綳了的布衣，彼此還在談笑或且討論些甚麼重要的事情，好像是小書記，學生或且普通的勞動英雄的人物，常常也就是黨的優秀幹部，政府的高級官吏和著名的大學教授。

在那愉快的農婦、女工、女職員、女學生和女教師的一羣中間，就有出色的女革命家、女小說家、女教育家和女演員。她們穿着同樣簡單的衣服——棉布製的衫袴，藍的、灰的、褐的、黑的或且白的襯衫或罩衫。她們都喜歡戴上一頂軍帽，在這神祕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裏，軍帽似乎已經和一切年紀的男女發生着密切的關係。

當我走過延安許多空虛的山谷，和訪問那些充滿着生命與活力的原始的窑洞，這簡陋的農村似的地方和她對於中國所要肩負起的使命間的強烈對比，一次又一次地給我深刻的印象。

延安，這末一個小小的城市怎麼能夠勝得過重慶，當作另一半個中國的首都，另一個抗戰的指導

中心，和新中國的雛型呢？

延安，她只有四萬的人口，其中還包括着一萬二千的士兵、黨政長官和學生；沒有電燈和近代的機器；除了四輛或五輛舊式的貨車之外再沒有其他的汽車；實際上講，沒有可稱爲路的道路，沒有可以航行的水道；沒有可以從外面運東西進來的飛機；但是她控制了分散深入到敵後，而受敵人無數火綫割裂着的廣大根據地，領導着八千萬的人民；此外，她還管理着僅有的一個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半封鎖着的後方，陝甘甯邊區。這裏三方面受到國民黨軍隊的嚴密包圍，另一面的大部份，還對着沿黃河的强大日軍。

重慶，她差不多有一百萬人口，她有電力廠、工廠和近代化的機器，有幾千輛貨車和摩托車，幾千哩的汽車路和可以航行的水道；幾百架每天運輸供給品進來的盟國飛機；同時她還有相當肥沃的，緊密連在一起的廣大後方，和一萬五千萬的人民。

跟延安比起來，從遠大方面看，我覺得，重慶對延安的競賽，並沒有比我所想像的讓了多少，而她的潛在力——強力的民主政治長期所可能動員的，應該比我所常常確信的有更可驚人的發揮。

重慶繼續退化的圖景，常常給我夢魘般的感覺。就我近年來所見的情形說，重慶是表現着厭戰，鬆弛和無助的樣子；灰色的，被炸毀了又修補過的建築物，和新的竹蓋的屋子，向着場子江邊青綠色的、富饒的田野蔓延開來，愈見擴大起來，但顯得沒有生氣；沉浸在污穢的街道上，那令人窒息的商業氣氛裏的，日見增多的人民，顯得很緊張和沒有目的似的——這些人民一直都準備着不但去忍受痛

苦，而且還要去接受戰爭的動員；官吏們一年復一年地坐在那使人困憊的，擠滿了人又似乎人人無事可做的政府辦公室裏——不管願意不願意，看着戰爭拖延下去，或且準備去幫助懶惰的政府克服一切的困難，做很好的革新，但是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却帶來了更多的失望和更大的沮喪；重慶——實在的——照事實而並不根據她自己的宣傳講——是一個動人憐憫的城市，它不是積極的努力抗戰而是消極的忍受着戰爭的痛苦，不是鼓舞着戰鬥熱情而是在作無效的掙扎。

小的延安可能勝得過大的重慶——因為中共很知道如何去運用人民的手和腦的偉大力量，他們相信人民是有着無窮盡的力量——難道我不能說這是真實的嗎？

在我剛來這兒六星期，就想去判斷這些問題以及我初步研究中所發生的其他問題，也許仍舊還是太早些。但是我覺得已經可能把這兩個城市顯著不同的氣氛，歸納出一些初步的結論來了。

下面就是那時候我寫在日記上的。

第一，這裏沒有厭戰的情形，却有着先驅者那種堅定的戰鬥熱情。大多數的領導者和成千成萬的其他革命者，都經歷了十七年的戰爭——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戰開始前幾個月為止的對國民黨的十年內戰，七年的抗日戰爭——自一九四一年起還加上對國民黨實質上的內戰。戰爭，很明顯地，已經變成他們的職業了。

第二，這裏沒有依賴外來的幫助。他們要爭取外援，但不依賴外援。在十七年當年，他們是生活

和戰鬥在幾乎是水洩不通的封鎖線裏。因此自力更生就變成他們的第二天性了。

第三，這裏的人民似乎都是非常年青，任何年紀的人都充滿着新的樂觀主義和自信。他們不斷遭遇到遠較今日爲甚的困難，但是他們都把它克服了。不管我們相信不相信，他們似乎都以爲將來一定是他們的。

第三，這裏看不到私人間的攻訐。也沒有像重慶那種清談和背後誹謗的現象。在重慶，只要過了幾天，一個新來者就會被圍困在對於某某同僚和長官的非議的耳語和窘境裏。但是，延安有着對於他們制度中間所留下來的缺點作批評的，大眾的言論，這在重慶是不能許可的。

第五，他們的缺點，主要是農村環境和歷史的不良傳統所反映出來的，關於工作效率的一方面的，這些缺點不比重慶的國民黨員所有的來得嚴重。因爲他們運用着自我批評的至高熱忱，和最大的決心，盡一切可能去克服任何缺點，必要的時候，他們會採用政治上清算的政策，這種政策曾是被珍愛着，當作給予錯誤的最後回答。

第六，延安的領導者瞭解國民黨和國民黨區域的情形，此國民黨瞭解中共和中共區域的情形來得清楚；他們善於區別國民黨的誹謗和政策，做出正確的估計，他們的論斷是理論分析的而不是單憑情感的。

六星期後，我們訪問團裏的國民黨員從邊區回重慶去。他們說他們的報館編輯有許多比研究中共

情形更重要的工作要他們做；我們的政治顧問自從我們不受拘束，獨立行動以後，也感覺得他們已經沒有甚麼用了。

他們提議帶我們一起回重慶。但是我們提醒他們，訪問團的每一個人，爲着得到來延的許可，都會向蔣委員長立過誓約——我們在延安至少要逗留三個月呀！

『不要提起對蔣委員長的誓約吧』，他們這樣告訴我們。『難道你們在延安看到的聽到的還不夠嗎？』

只有桑納漢神父，一位美國教士，跟他們一道走，因爲他已經和中共交涉好恢復邊區天主教堂的事；假使重慶還是拒絕應邀來延的傳教士回去的話，這種交涉將要變成毫無價值了。

三位主要的國民黨顧問離開延安的時候是很不高興的，從我們那些送到重慶最後檢查之前要經過他們預檢的信件中，和我們跟他們的坦白談話中，他們曉得我們對於所聞所見的一切都有非常好的印象。其中兩位顧問很坦白地對我們表示，蔣委員長讓我們來延安是一個大錯誤，假使他還以爲一個長期的逗留，會使我們相信中共的行政工作無異於趣劇，中共的抗日努力不過是一種戲弄，那就是更大的錯誤。

他們應該承認，像大半國民黨新聞記者所承認的一樣，蔣委員長似乎是受了蒙蔽，那是多麼壞的事呀，蔣在重慶的周圍小人，無疑地，常常將他們所揣度的，關於延安蔣所要知道的事告訴蔣。在西安的半法西斯的煽動份子，切望把蔣推向另一個內戰裏，因此他們很明顯地有意供給許多不確實的情

報，使蔣以爲這種冒險是必須的，也是比較容易成功的。

我們曾經全體去訪問過延安的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在那裏，該報的編輯給我們證明了，蔣委員長自己關於延安的情報，的確是經過西安的反共十字軍檢查過的。西安的郵件檢查處曾有官方文告通知解放日報，如有報紙由延安寄給下列人物將遭沒收：蔣介石委員長，馮玉祥將軍（有名的基督將軍），陳誠將軍（現任——一九四五年——陸軍部長）周恩來將軍（中共駐渝代表）和其他幾位。不久以後，重慶委員長的首腦部就寫信給解放日報，責備着好幾個月沒有接到報紙了。

在我跟訪問團裏的國民黨員談話中，我發現其中有好幾位，當他們在延安看到了任何普通的一個人都能夠在最困苦的環境裏工作，人的潛在能力得到了解放的時候，他們都陷入信念矛盾的煩惱中了。他們愛中國的心，使他們不得不承認延安的許多成就，將給未來他們的國家帶來了很大的希望。用中國人傳統上有禮貌的說法，他們羞怯地也表現出我們在延安所共同看到的一些人物和制度的那一種民族的光榮的一些標記。

在另一方面，當他們發現延安比他們所想像的來得更強大更成功和更穩定的時候，忠於國民黨的心，又似乎使他們更加仇恨和恐懼共產黨了。在他們自己的集團內孤立起來，又或多或少在他們之間少數自私自利的反動份子的影響下，他們即使在延安也只能呼吸到重慶那一種令人窒息的空氣。爲着抵消他們那毫無疑惑餘地的，有希望的發現——像邊區驚人的生產，軍隊非常好的健康和士氣，和激

動了這一部份中國人民的先驅者的精神——他們有意地加重對於新民主主義的實質的懷疑。

我同樣也覺得還是很可疑的。但是，在繼續作更詳細研究之前，我得先把我在這最初六個月內所得到的，對於延安的新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種不同樣式的印象，選拔一些出來，看看他們究竟如何適當地嵌鑲在可信的整體中的。





作者小傳

根室·史坦因 (Grunther Stein) 是美國的名記者，他在亞洲從事記者生涯凡十二年。他是英國曼徹斯特導報，倫敦新聞記事報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特約記者。在一九四四年的夏秋，他與重慶所特准的第一批新聞記者考察團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首都延安。他在那邊待了整整的五個月，他對於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中的驚人發展底報道和分析是最完善，最客觀，最權威，也是最人性的。



國家圖書館



001708586



5